

闻

一多

论唐诗

万卷名家讲谈辑粹

挥动如椽大笔

撰写万言小文

举重尤若轻

切实而浅明



闻一多·著 云翥·整理



万卷出版公司

I207.22/226

2008

万卷名家讲谈辑粹

闻一多 论唐诗

闻一多 著



万卷出版公司



© 闻一多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闻一多论唐诗 / 闻一多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7
ISBN 978-7-80759-186-3

I. 闻... II. 闻...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317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0mm × 224mm

字数: 140 千

印 张: 11

出版时间: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会鹏

责任校对: 陈文本

装帧设计: 北京子之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ISBN 978-7-80759-186-3

定 价: 19.8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出版说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历史环境的激荡，中西文化之碰撞，使传统的学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为我们留下许多足以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大师们的开拓性成果，依然是多门学科研究的起点。年青一代研读到大师们的著作，受益是多方面的。

闻一多(1899—1946)先生正是这一时期一位重要的大师。在今天的青年人眼中，闻一多首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民主斗士，事实上，他更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早年，闻一多留学美国，学习美术和文学，先后在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曾加入新月社，致力于诗歌创作，著有诗集《红烛》、《死水》。他的诗风在形式上求格律化，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及唐诗、神话、古文字等诸多研究领域，作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闻先生的研究工作：“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就闻先生

的学术成就而言，这种评价绝非溢美之辞，是对闻先生治学最为准确的概括。

《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其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报章杂志上，后来汇编成册。书中内容涉及类书与诗的优劣、宫体诗的堕落与自赎、文章体裁、著名诗人、诗人年谱以及诗歌的翻译等多方面的内容，故名之曰杂论。这本小书是闻一多先生站在一个崭新的角度，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研究唐诗的结晶。对唐朝一些著名的诗人“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分析。文章论述精辟，引用的诗歌皆具有代表性，语言生动形象，兼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引人入胜，读来颇为惬意。与传统的学术研究相比，本书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因此能够多所创见。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它在唐诗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在今天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同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这对我们今天的学者仍然富有启迪。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一经典作品以新的形式提供给年轻的读者已成为必要。为此，我们将本书纳入“万卷名家讲谈辑粹”丛书中予以重新整理出版，以飨读者。相信对于青年读者了解唐诗发展的一些基本脉络，促进唐诗研究都会大有裨益。

本书所选内容，参校了已经出版过的多种版本，凡作者行文有见疑之处，一仍其旧，除个别明显错讹之处作了修改外，一

些符号习惯原则不作改动，以存原貌。同时，近代学者著作，在引用书证时，有或略或减，或略去出处之习惯，闻先生著作中亦有此种现象，限于本书体例和宗旨，未做专门校补，望读者明察。为了便于专业之外的普通青少年读者阅读，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工作：随原著的文字附上了相应的评论文字及唐人诗句，以帮助读者扩展相关的知识；删去了《岑嘉州系年考证》一篇纯考证且与其他篇目联系不大的文章；为原著配上大量的图片，使得读者能够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

愿这辑小书能使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果流布到普通读者手中，增进更多的朋友对唐诗的兴趣与了解。

编者

目 录

出版说明	1
朱自清序	1
类书与诗	11
宫体诗的自赎	21
四杰	35
孟浩然	45
贾岛	53
杜甫	61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79
英译李太白诗	155

朱自清序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本集里承臧克家先生抄来三十二年他的一封信，可以见出他这种三位一体的态度。他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

这是斗士藏在诗人里。他又说：

你们做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

懂诗。……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他又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后来的他却开了“民主”的“方单”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斗士姿态出现了。但是就在被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

闻先生真是一团火。就在《死水》那首诗里他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在《死水》这诗集的另一首诗《口供》里又说：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绝望”不就是静止，在“丑恶”的“垃圾桶里爬”着，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不能静止，在《心跳》那首诗里唱着：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路，
谁希罕你这场内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所以他写下战争惨剧的《荒村》诗，又不怕人家说他窄狭，写下了许多爱国诗。他将中国看做“一道金光”、“一股火”（一个观念）。那时跟他的青年们很多，他领着他们做诗，也领着他们从“绝望”里向一个理想挣扎着，那理想就是“咱们的中国”（一句话）。

可是他觉得做诗究竟“窄狭”，于是乎转向历史——中国文学史。他在给臧克家先生的那封信里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同在三十二年写作的那篇《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说起“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他说：

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膊碰上了胳膊，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



相吸收，融合，以致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

这就是“这个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句话的注脚，但是他只能从中国文学史下手。而就是“这角落”的文学史，也有那么长的年代，那么多的人和书，他不得不一步步地走向前去，不得不先钻到“故纸堆内讨生活”，如给臧先生信里说的。于是他好像也有了“考据癖”。青年们渐渐离开了他。他们想不到他是在历史里吟味诗，更想不到他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告诉臧先生：“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要创造的是崭新的现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一篇巨著虽然没有让他完成，可是十多年来也片段地写出了一些，正统的学者觉得这些不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就戏称他和一两个跟他同调的人为“闻一多派”。这却正见出他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披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这时期最长，写作最多，到后来他以民主斗士的姿态出现。青年们又发现了他，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行动虽然时时在要求着他，他写的可并不算少，并且还留下了一些演讲录。这一时期的作品跟演讲录都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和精悍之气，就是学术性的论文如《龙凤》和《屈原问题》等也如此。这两篇，还有杂文《关于儒·道·土匪》大概都可以算得那篇巨著的重要的片段吧。这时期他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了一片”，有人说他不懂政治，他倒的确不会让政治的圈儿箍住的。

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

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在这些里找训诂的源头。从本集二十二年给饶孟侃先生的信可以看出那时他是如何在谨慎地走着这正统的道路。可是他“很想到河南游游，尤其想看洛阳——杜甫三十岁前后所住的地方”。他说“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我不知杜甫传如何写”。这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考据家了！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吧，他给臧先生写着：

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生活这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从他后来关于文学的几回演讲，可以看出他已经是在跨着这一步。

然而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他在前一个时期里却指出过“文学的历史动向”。他说从西周到北宋都是诗的时期，“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诗史”。可是到了北宋，“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上前“接力”的是小说与戏剧。“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起便转向

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他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的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而“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于是乎他说：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地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敢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继续做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这里强调外来的影响。他后来建议将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跟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跟语言学系，打破“中西对立，文语不分”的局面，也是“要真正勇于受”，都说明了“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那句话。可惜这个建议只留下一堆语句，没有写成。但是那印度的影响是靠了“宗教的势力”才普及于民间，因而才从民间“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人民的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是文学史发展的基础，在诗歌等等如此，在小说戏剧更其如此。中国文学史里，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登大雅之堂，士大夫始终只当它们是消遣的玩意儿，不是一本正经。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能够脱去了俗气，也就是平民气。等到民国初年我们的现代化的运动开始，知识阶级渐渐形成，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洲的影响，也接受了“欧洲文学的主干”的小说和戏剧，小说和戏剧这才堂堂正正地成为中国文学。《文学的历史动

向》里还没有顾到这种情形，但在《中国文学史稿》里，闻先生却就将“民间影响”跟“外来影响”并列为“两大原则”。认为，“一事的二面”或“二阶段”，还说：“前几次外来影响皆不自觉，因经由民间，最近一次乃士大夫所主持，故为自觉的。”

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稿》其实只是三十三年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大纲，还待整理，没有收在全集里，但是其中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分为四段八大期，值得我们看看：

第一段 本土文化中心的转成 一千年左右

第一大期 黎明 夏商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二五〇〇——一〇〇)约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 从三百篇到十九首 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 五百年的歌唱 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陈灵公卒，《国风》约终于此时，前一〇九九——五九九)约五百年

第三大期 思想的奇葩 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元二年(前五九八——八七)五百一十年

第四大期 一个过渡期间 汉昭帝始元元年至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前八六——后一九五)二百八十一年

第三段 从曹植到曹雪芹 一千九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 诗的黄金时代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一九六——七五五)五百五十九年

第六大期 不同型的余势发展 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七五六——二七六)五百二十年

第七大期 故事兴趣的醒觉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一二七七——一九一七)六百四十年

第四段 未来的展望——大循环

第八大期 伟大的期待 民国七年至……(一九一八——……)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转成”，最显著的标识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变为殷周的铜器花纹，以及农业的兴起等。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指的散文时代。第六大期“不同型的余势发展”指的诗中的“更多多样性与更参差的情调与观念”以及“散文复兴与诗的散文化”等。第四段的“大循环”，指的回到大众。第一第二大期是本土文化的东西交流时代，以后是南北交流时代。这中间发展的“两大原则”是上文提到的“外来影响”和“民间影响”。而最终的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这就是闻先生计划着创造着的中国文学史的轮廓。假如有机会让他将这个大纲重写一次，他大概还要修正一些，补充一些。但是他将那种机会和生命一起献出了，我们只有从这个简单的轮廓和那些片段，完整的，不完整的，还有他的人，去看出他那部“诗的史”或那首“史的诗”。

他是个现代诗人，所以认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他说新诗得“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准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来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他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惠特曼，而转瞬间便是最真

实的诗了，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

那时他接受了英国文化界的委托，正在抄选中国的新诗，并且翻译着。他告诉臧克家先生：

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唯其曾经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撷取这项工作的热心，唯其现在不再写诗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的头脑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我想我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

是的。一个早年就写得出《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那样确切而公道的批评的人，无疑的“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可惜这部诗选又是一部未完书，我们只能够尝鼎一脔！他最后还写出了那篇《时代的鼓手》，赞颂田间先生的诗。这一篇短小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波动，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又在三十四年西南联合大学五四周的朗诵晚会上朗诵了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演戏的才能和低沉的声调让每一个词语渗透了大家。

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直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抄选新诗。在被难的前三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成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农民的严肃的工作。这样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朱自清三十六年(1947)八月，清华园



全唐詩

太宗皇帝

帝姓李氏諱世民神堯次子聰明英武貞觀之治庶幾
成康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而錄情經術初建
秦邸即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既即位殿左
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論
典籍雜以文詠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詩筆草隸卓越
前古至於天文秀發沈麗高麗唐三百年風雅之盛
帝實有以啓之焉在位二十四年諡曰文集四十卷館
閣書目詩一卷六十九首今編詩一卷